

随

园

荷

积

中国古代文学：文献与理论研究

《春秋》经传研究



赵生群◎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《春秋》经传研究

赵生群◎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《春秋》经传研究/赵生群著. —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0. 5

ISBN 7-5325-2698-4

I. 春… II. 赵… III. ①春秋—研究②左传—研究
IV. K225.0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0)第18372号

《春秋》经传研究

赵生群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272号)

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11.125 插页 5 字数 230,000

2000年5月第1版 2000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2,000

ISBN 7-5325-2698-4

Z·351 定价 24.00元

前 言

经学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是显学。六经出自孔子,在群经中具有突出的地位。六经之中,唯有《春秋》为孔子亲自制作,且与政治联系最为紧密,故尔成为历代文人学士关注的重点。千百年来,研究《春秋》三传的著作,真可谓汗牛充栋,指不胜数。仅是见于《四库全书》、《皇清经解》、《皇清经解续编》的有关著作,就有数百种之多。前代学者在文字、音韵、训诂、史实考订、义理探求诸方面,倾注了大量的心血,取得了可观的成绩,这是毋庸置疑的。但用今天的眼光来看,对于《春秋》经传的研究,并非题无剩义。特别是对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,如《春秋》的作者、《左传》的性质及其与《春秋》的关系、无经之传和有经无传的问题、叙事与解经的关系问题等,人们见仁见智,看法往往尖锐对立。而这些问题不解决,势必会影响到《春秋》学研究的继续深入。因此,重新审视前人的研究立场和方法,在借鉴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掘新的材料,进行新的探索,不仅是可能的,而且是必需的。

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争,一直持续了两千年。因为学派之争,门户之见,往往使一些学者产生某种先入为主的成

见,对不同的观点采取排斥、贬抑、甚至是不屑一顾的态度。《春秋》经传研究,情况也是如此。西汉时,刘向奉诏“受《穀梁春秋》”,其子歆“治《左氏》”,他们治学立场不同,各持己见,谁都不肯让步。《汉书·楚元王传》云:“(刘)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,亲见夫子,而公羊、穀梁在七十子后,传闻之与亲见之,其详略不同。歆数以难向,向不能非间也,然犹自持其《穀梁》义。”刘歆《移太常博士书》激烈地批评当时学者“信口说而背传记,是末师而非往古”,“保残守缺,挟恐见破之私意,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,或怀妒嫉,不考情实,雷同相从,随声是非”,“专己守残,党同门,妒道真”。后来学者,或申《公》、《穀》,或主《左氏》,往往壁垒分明(就大体而言),前者如刘逢禄、康有为、皮锡瑞,后者如杜预、孔颖达、刘师培等。有些学者虽不主一家,也大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家法门户的影响。由于师承之别,产生不同的见解,由于争立学官,关系到学派兴衰及有关学者的功名利禄,恪守家法,排斥异己,事出有因。但是,这显然不利于学术的发展。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传自孔门后学,左氏亲接夫子,三家说经虽有长短得失,但都渊源有自,各有所长,未可一概排斥。因此,死守一家,实不足法。张高评云:“溯夫周季汉初之儒,凡治《春秋》,均三传并治,非惟荀卿之书可征,即陆贾《新语》,毛公说《诗》,亦皆三传互引。足证三传同说《春秋》,故前儒治经,左右采获,不囿于一家之言如此。^①既知三传同说《春秋》,又知三传有得有失,然后可以治《春秋》。学者治《春秋》,可以一传为主,而不可偏执尽以为是:一传之独得,在所必取;一传之大失,固所必废,只是平心看事理事情势,准于大公至正,量度而参取之,则治《春秋》庶乎其不差

矣。”^②这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。

前人研究《春秋》，有主张舍传求经者。唐代啖助、赵匡、陆淳已有这种倾向，韩愈谓卢仝“《春秋》三传束高阁，独抱遗经究终始”，^③宋代崔子方云：“夫万有八千言之间，虽非传者一言之辩，而《春秋》了可知也。”^④沈莱“抱遗经以见圣人之志”，^⑤赵鹏飞以为“学者当以无传明《春秋》，不可以有传求《春秋》”，^⑥清代王心敬主张“以经解经”，^⑦可谓异口同声。刘逢禄彻底否定《左传》为释经之传资格，意欲“以《春秋》还之《春秋》，以《左氏》还之《左氏》”，^⑧则是主张离开《左传》所载史实探求经义。这些说法颇能耸人听闻，而实际上并不可取。《四库全书·春秋经筌提要》云：“夫三传去古未远，学有所受，其间经师衍说，渐失本意者，固亦有之。然必一举而刊除，则《春秋》所书之人无以核其事，所书之事无以核其人。即以开卷一两事论之：元年春王正月不书即位，其失在夫妇嫡庶之间，苟无传文，虽有穷理格物之儒殫毕生之力据经文而沉思之，不能知声子、仲子事也。郑伯克段于鄢，不言段为何人，其失在母子兄弟之际，苟无传文，虽有穷理格物之儒殫毕生之力据经文而沉思之，亦不能知为武姜子、庄公弟也。然则舍传言经，谈何容易！”又《春秋原经提要》云：“（王心敬）尽废诸传，惟以经解经，不思经文简质，非传难明。即如郑伯克段于鄢一条，设无传文，则段于郑为何人，郑伯克之为何故，经文既未明言，但据此六字之文，抱遗经而究终始，虽圣人复生，沉思毕世，无由知其为郑伯之弟，以武姜内应作乱也。是开卷数行，已窒碍不通，无论其余矣。”此外，隐、闵非命，般、恶不终，实为弑君，而《春秋》书“薨”、“卒”。赵穿行弑，《经》书赵盾；郑公子

归生、楚公子比胁从,《春秋》独书其名;陈乞无意于弑,而孔子指为首恶;许太子进药疗父之疾,经文以为弑。凡此种种,如果离开传文,将连最基本的事实都搞不清楚,遑论探讨《春秋》大义!事实上,就连声称舍传求经的人,也无法真正贯彻自己的主张。如沈某欲“舍传而独考”“圣人之志”,而所著书,或三传并称,或单称“左氏”、“公羊”、“穀梁”,或简称“左”、“公”、“穀”,从三传比较立论者,多至不可胜举。又如,赵鹏飞自己也承认:“吾读《春秋》至此间(僖公十八年),有不可考而求传者五:隐二年郑人伐卫,经无兵端,庄十七年,齐人执郑詹,僖四年齐人执陈涛途无罪端,十五年晋侯及秦伯战于韩,经有事端亦无兵故,今齐桓卒未葬而宋及三国伐齐,则事端兵故经皆无其文。”又云“经所不能详”者,“学者当质诸史”,因而《左氏》“亦不可尽废”。刘绍攸撰《春秋笔削微旨》,利用《左传》所载史实理解《春秋》,又谓《左氏》不过叙事,于经毫无发明,《四库提要》一针见血地指出:“(绍攸)幸藉传而知其事,又讳所自来,以传为不足据,是何异迷途之人藉人为导,得途之后鞭其人而逐之乎!”桓谭有云:“《左氏传》于《经》,犹衣之表里,相待而成。《经》而无《传》,使圣人闭门思之,十年不能知也。”^⑨舍传求经,结果只能是事倍功半。

本书在写作过程中,主要注意了以下一些方面。

一是研究的系统性和创造性。《春秋》经传研究的许多问题都互相联系、交织在一起。如《春秋》的作者,与《左传》是否为解经之作,就有关联;《左传》是否为丘明所作,与《左传》的性质,实难截然分开;《左传》无经之传、有经无传与它以事解

经的方法,也有割不断的联系。这些问题,必须从总体上进行系统的研究,才有可能得到较为全面、正确的认识。创造性是学术研究的生命。本书在写作过程中,每一部分都是先写成独立的论文,在此基础上将各部分修改组合成一个整体。论文的各个主要部分,多由自己的心得组成,如论《左传》无经之传、有经无传、《左传》是否传经、《左传》以事解经诸章节。对前人已经较多涉及的论题,也力求在资料占有、研究角度和认识深度诸方面有所突破,如论孔子作《春秋》的有关章节。

二是内证的挖掘。围绕《春秋》经传的研究,许多问题长期争论不休,莫衷一是,与内证发掘不够大有关系。如,《左传》是否与《春秋》有关,前人研究所运用的材料,数量不多。其实,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两书俱在,只要仔细排比,有许多种资料都是可以利用的。比如,《左传》详于叙事,许多学者以此认定它是一部史书而非解经之作。本书有关章节用大量例证否定了这种说法。《左传》庄公二十三年载曹刿对鲁君之言,有云:“君举必书,书而不法,后嗣何观?”可见“君举必书”是史官记事的重要原则。但鲁公事迹见于《春秋》而《左传》不加记载者就有一百多例。最明显的如文、宣、成、襄、昭、哀六位君主即位,桓、宣二君之葬,《左传》就都没有记载。《左传》僖公七年载管仲之言称:“夫诸侯之会,其德刑礼义,无国不记。”襄公二十九载叔侯之言称:“鲁之于晋也,职贡不乏,玩好时至,公卿大夫相继于朝,史不绝书,府无虚月。”成公十三年载刘子之言称:“国之大事,在祀与戎。”可见诸侯会盟、各国行人往来、祭祀与战争都在史官记事范围之内。而大量事实表明,《左传》

对此类事多付阙如,即便记载,也大多以解经的形式出现,这说明它的目的不在述史而在解经。又如,人们多认为《左传》是一部独立的史学著作,而本文认为它必须依附于经文。《左传》记事,叙述不全、模糊不清、轻重失衡、与史实相悖乃至相反者不一而足。定公十五年《经》载:“(九月)丁巳,葬我君定公,雨,不克葬。戊午,日下昃,乃克葬。”《传》云:“葬定公。雨,不克襄事,礼也。”据《左传》之文,定公好像竟未葬成。宣公八年《经》载:“冬十月己丑,葬我小君敬嬴。雨,不克葬。庚寅,日中而克葬。”《传》文以为“不克葬”合乎礼而不载敬嬴之“克葬”,与葬定公之文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以叙事之笔看待此类传文,绝不可通。《左传》行文,多所省略,都是蒙经文而省,与经文合看无不晓畅明白,离开经文则百思不得其解。《左传》宣公五年云:“冬,来,反马也。”谁来?从哪国来?离开经文我们不得而知。《左传》桓公五年云:“仍叔之子,弱也。”离开经文,我们简直不知所云。《左传》记载诸侯会盟,常常省略月日、参与会盟之人(有时部分省略、有时则略称“诸侯”),或者干脆月日与会盟之人一并省略。这种情况在《左传》中极为普遍,说明《左传》只能与经文配合而不能完全独立。

三是统计分析。一些问题之所以长期聚讼难决,就因为它们具有复杂性。如果抓住一点,不及其余,便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。如有人认为《左氏》依经立传,也有人认为它“不必依傍圣经,可以独有千古”,“不主为经发”。这两种观点,都可以找到例证作为立论的依据。一般的举例说明,恐怕很难把问题说清楚。本书有关章节采取定量分析和定

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,将《春秋》与《左传》逐条加以对照统计,结果发现:截止于鲁哀公十四年“西狩获麟”条,《左传》中直接针对经文的条目有 1300 余条,与经文关系密切的有 100 余条,同解经关系不很直接的只有 300 条左右。这一统计数字从总体上确认了《左传》与《春秋》的对应关系。又如,一些学者认为有经无传条目的存在是《左传》不解经的重要证据,杜预、孔颖达则以“经是直文”、“体例已举”来概括《左传》有经无传的现象,但未作系统的分析。本书有关章节统计出此类条目共约 550 条,主要有六个方面的内容,其中四时之记载 56 条,天子诸侯等人崩薨卒葬 164 条,诸侯会盟征伐朝聘 173 条,自然情况 73 条,祭祀 21 条,其它共 60 余条,并在统计归纳的基础上对每类条目作了具体分析。其它针对具体问题所作的统计随处可见。

四是对比研究。有些问题,就事论事也许永远都说不清楚。运用比较的方法,有时可使问题变得简单明了。如,有经无传和无经之传是一些学者批评《左传》、否定它与《春秋》关系的主要依据。宋刘安世云:“《公》、《穀》皆解正《春秋》,《春秋》所无者,《公》、《穀》未尝言之。……若《左氏》则《春秋》所有者或不解,《春秋》所无者或自为传。”^⑩后世学者持类似观点者也不乏其人。如赵光贤云:“如果《左传》本来是解释《春秋》的书,那么《春秋》所有的记事,《左传》也应该都有;反之,《春秋》所无的,《左传》也应该无。但事实并不是这样,常常是经有传无,或经无传有。”^⑪这些观点,如果孤立地看,是很有道理的。但是,若将三传联系起来看,情况就大不一样了。有

经无传这一现象,不仅存在于《左传》,同样也存在于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。而且,《公》、《穀》两传有经无传的条目,数量远远多于《左传》。截止于鲁哀公十四年“西狩获麟”条,《春秋》经文的总数为 1870 条,^⑫《左传》依经作传的条目在 1300 条以上,无传的约 550 条。《公羊传》全书约 570 条,有经无传的条目约有 1300 条;《穀梁传》共约 750 条,有经无传的条目也在 1100 条以上。这一统计数字表明,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有经无传的现象,远较《左传》普遍。一些学者注意到,庄公二十年、二十六年这两年,《春秋》所有的记载,《左传》都没有相应的传文。其实,这也不是为《左氏》病。《公羊传》全年无传的有 38 年。它们是:桓公十七年,庄公十五年、二十一年,僖公十一年、十二年、十三年、三十二年,文公十年,宣公二年、七年、十三年、十四年、十七年,成公四年、七年、十一年、十四年,襄公十四年、十七年、二十年、二十二年、二十四年、二十八年、三十一年,昭公三年、六年、七年、十年、十四年、二十四年、二十八年、三十年,定公三年、七年、十一年,哀公元年、十年、十一年。《穀梁传》全年无传的也有 18 年。它们是:僖公三十二年,文公十七年,宣公十三年、十四年,成公四年、十一年,襄公四年、十三年、十四年、十七年、二十二年、二十八年,昭公六年、十年、十六年,定公三年,哀公十年、十一年。既然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有经无传的现象更为突出,我们自然也就没有必要独独苛求《左传》,要求它对每条经文都作出解释。过去人们对《左传》的无经之传注意较多,批评也更为激烈。而对《公羊传》、《穀梁传》也同样存在此类条目,却很少论及。隐、庄、闵、僖四君,《春秋》不书即位,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逐一解释其“不言即位”

的原因。隐公二年,《春秋》载夫人子氏薨,三年,天王崩,十一年,公薨,庄公三十二年子般卒,僖公九年宋公御说卒,二十三年宋公慈父卒,宣公十八年楚子旅卒,《公羊传》一一释其“何以不书葬”;《穀梁传》于宋公慈父之“不葬”,闵公之“不书葬”,夫人子氏之“卒而不书葬”,也一一加以说明。隐公七年,《春秋》载叔姬归于纪,庄公二十五年,伯姬归于杞,《穀梁传》均释经文“不言逆”之意;庄公十八年《经》载公追戎于济西,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释其不言戎来伐之故;僖公十年《经》载晋杀其大夫里克,《公羊》释其“不言惠公之入”之动机;二十八年《经》载晋人执卫侯,归之于京师,《公羊传》释卫侯杀叔武“何以不书”;文公二年《经》载“及晋处父盟”,《穀梁传》释何以“不言公之如晋”。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两传还有从总体上或一定范围内概括《春秋》不书之例的条目。如:隐公十年《公羊传》云:“《春秋》录内而略外。于外,大恶书小恶不书;于内,大恶讳小恶书。”僖公十年《穀梁传》云:“晋之不言出入者,踊为文公讳也。齐小白入于齐,则曷为不为桓公讳?桓公之享国也长,美见乎天下,故不为之讳本恶也。文公之享国也短,美未见乎天下,故为之讳本恶也。”宣公十八年《公羊传》云:“吴、楚之君不书葬,辟其号也。”昭公十三年《穀梁传》云:“变之不葬有三:失德不葬,弑君不葬,灭国不葬。”又,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两传解释《春秋》,常常是“不书”与“书”、“不言”与“言”、“不志”与“志”、“不道”与“道”并举。在作者看来,《春秋》之所书,因其不书而显,《春秋》所不书,因其书而明。书与不书,错互成文,各尽其用,它们相辅相成,相得益彰。某类事不书,而其中某事书,必有深意;反之,某类事书,而其中某事不书,也不能视同寻常。

《春秋》的“微言大义”，正是在笔与削、书与不书之中得以显现。以上这些，都说明两传解经，不仅重视《春秋》之所书，而且关注经文之所不书。这与《左传》解经，如出一辙。

注：

①张氏自注：“详参章太炎先生《春秋左氏疑义问答一》。又，刘申叔《春秋三传先后考》亦言及此，可参阅。”

②张高评：《左传导读》第二章“论三传之得失与会通”。

③韩愈：《寄卢全》。

④崔子方：《春秋经解序》。

⑤沈果：《春秋比事序》。

⑥赵鹏飞：《春秋经筌序》。

⑦《四库全书总目·春秋原经提要》。

⑧刘逢禄：《左氏春秋考证》。

⑨《全后汉文》卷十四引《新论·正经》。

⑩见马永卿《元城语录》卷中。

⑪赵光贤：《左传编撰考》（上），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《古史考辨》。

⑫据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八月版《春秋左传集解》。



作者简介

赵生群 1957年生，江苏宜兴人。文学博士。主要论著有《史记文献学丛稿》、《太史公书研究》，发表文史学术论文约70篇。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。

随
园
新
积



中国古代文学·文献与理论研究

Z·351 定价: 24.00 元

ISBN 7-5325-2698-4



9 787532 526987 >

- 《春秋》经传研究
- 庄学概说
- 楚辞美学
- 贾谊集解
- 《史记》文献学从稿
- 魏晋风度与音乐
- 隋唐五代诗歌史
- 唐刺史考全编
- 唐诗艺术学导论
- 唐诗抒情艺术研究
- 唐诗艺术范式论
- 宋诗学导论
- 宋代咏梅文学考论
- 词话史
- 元代戏剧学研究
- 元明散曲史论
- 归有光评传
- 明代诗文的演变
- 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
- 明清文学思潮的演进
- 近古社会文化与叙事艺术
- 清凉文集
- 明清小说美学导论
- 清代别集总目
- 中国古代小说的主题与叙事结构
- 中国章回小说史
- 中国诗学精神
- 中国文化概论
- 轴心时代的中国思想
- 中国审美文化论
- 近代江苏藏书研究
- 江苏文化史论
- 诗歌意象学



总 序

随园,是清乾隆时期著名文学家袁枚的故居。我们南京师范大学,恰好坐落在随园旧址大略所在的那一片山丘及其附近的旷地。校区内古木参天,芳草茵地,鸣禽时变,檐翼欲飞,风景之清幽美丽,俨然是一座道地的南国园林。因此,许多年来人们习惯上也将南师校园称作“随园”。

我们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,是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全国首批博士学位点和硕士学位点之一,又是我院“博士后流动站”和“国家文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”的骨干学科,国家“211工程”重点建设项目“中国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化”的带头学科。本学科教师的教学和研究方向,涵括古代文学、文献学、古代文论等各个门类,从先秦直至晚清等各个时代,诗文、词曲、戏剧、小说等各种文体,覆盖面甚广。其中唐代文史研究、词学研究、明清小说研究等在国内外学术界具有较大的影响。

建国以来,本学科曾经拥有唐圭璋、孙望、段熙仲、诸祖耿、吴调公等著名学者,出版过《全宋词》、《全金元词》、《词话丛编》、《元次山年谱》、《水经注疏》校点、《战国策集注汇考》、《李商隐研究》等高质量的著述。他们不仅以自己严谨的学